

旁观者说

肖复兴

## 文化名人不是随处可撒的胡椒面

于丹此次马失前蹄,表面上就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即使你精通昆曲,面对的毕竟不是你的专长,实在没有必要做这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最近,网上和报端关于于丹的负面新闻多了起来,使得她最开始出现在央视百家讲坛上所塑造的形象有所受损。前两天,在北大百年讲堂的一场昆曲名角的演出上,于丹出场被哄而不尴不尬退下,一时占据了报端的一隅。由于事发北大,越发引人注目,由此北大带着吃“瓜落儿”。一时间,众说纷纭,对于于丹,力挺者和拍砖者,兼而有之,以致拔出萝卜带出泥,涉及尊重与文明,甚至将蔡元培老先生的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抽了出来,主办方还说出了“网络暴力”……雨打芭蕉,都向着于丹抛洒而来,水发海带一样,都在尽情地自说自话。

其实,这个时代,是大众最愿意拿名人开涮的时代。但是,不要以为大众朝云暮雨,是一会儿狂捧一会儿狠贬的变色龙。大众的选择,往往隐含着大众文化中既定的审美取向和道德标准,尽管这样的取向和标准有时候摇摆不定。这一次,大众选择了于丹,不能说大众对于于丹是出于羡慕嫉妒恨,也不能说活该于丹倒霉催的偏偏要出席这样的一场演出而导致无中生非。醋打哪儿酸的,盐打哪儿咸的,总有一定的规律,脚上的泡都是走出来的。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走出书斋和象牙塔而粉墨登场走向大众文化的舞台,就一定如演员一样,总会有盛有衰,潮起潮落,不可能总会有着光鲜的“挑帘好”,而不能有



被喝倒彩儿的时候。这样的规律,相信会给不仅于丹而是更多聪明的文化明星一个有益的提示。

于丹为这个社会奉献了许多的“心灵鸡汤”,做出了她独有的贡献,并不能因为这是“心灵鸡汤”就遭否定。鸡汤毕竟不是白开水,更不是毒药。只是鸡汤总有喝腻的时候。大众文化就是这样东边日出西边雨,在转瞬之间寻找着下一个追捧的新偶像,就像在转瞬之间找下一个开涮的对象一样。这是作为走出传统课堂和书斋而步

入新媒体前沿的文化名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因此,文化名人要明白,自己只是大众文化旋转机器的齿轮之一。他们所咬合的与其说是自己的专长——文化,其实不过是大众文化对这些文化的兴趣,利用和颠覆。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生产,便也就把文化名人置放在了一个生产的机制里,可以以包装制造任何明星的方式,将包装制造出的文化英雄捧上云端,也可以作为商品在有效期内分期升值或打折,乃至颠覆置于脚下。因

此,此次在北大百年讲堂的遭遇,于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文化名人。

文化名人需要有自知之明,自己即便再学有专长,哪怕是学富五车,也不可能包打天下,遇水搭桥,见山开路,处处逢凶化吉。文化名人不是万金油,可以随用随擦;不是胡椒面,可以到处去撒。于丹此次马失前蹄,表面上就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即使你精通昆曲,面对的毕竟不是你的专长,实在没有必要做这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当然不必再皓首穷经,固守书斋,当然可以借助网络和电视,让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融合而彼此互惠,也可以成为文化产业链中的一种而受益于双方。但是,需要警惕和自律的是,无论金钱的诱惑还是友情的出演,或是对方商家灿若莲花的游说,有些地方,文化名人是要慎行的。并不是说那些地方一定是陷阱,但有可能是被利用的泥塘。而我们有些文化名人容易将这泥塘误以为是席梦思软床。

因为,我们的文化名人是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正如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在这样的时代里,“所有事物都暴露在信息和讯息残酷无情的光芒里。”他说的“光芒”尤为值得注意,我们常常被这样的光芒所误甚至刺伤,却极愿意飞蛾扑火一般投向它。

人生边上

## 我们欠着父母的 是什么

赵先德

我有两位让我感到敬佩的亲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一位是我的岳母。再有十几天就是母亲九十二岁大寿了,不巧的是赶上九十七岁的岳母病危。有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往返于山东与深圳之间,岳母家没有儿子,母亲住在深圳。空中冥想,两个已近暮年的老人给予我们的最有力量的人生智慧是什么呢?想来想去,仁慈与对生命的热爱,或许最为贴切。

岳母生有六个孩子,在她中年的时候,她的儿子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师范学校的优秀青年。不幸的是,师范毕业后患病早逝。这个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又赶上那时整个国家都处于特殊的困难时期。家境生活的窘迫接踵而至,但是岳母挺了过来。后来,凭我的观察,似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勤劳与热爱生活。她似乎是最近两年在我们为她寻到一个保姆后,她才不至于亲力亲为地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快到九十岁那年,初冬她竟爬上磨盘,踩着小脚拔出烟囱里夏天堵上去的一团草,吓得目瞪口呆的邻居目瞪口呆。劳动和伺候下地劳动的男人是她一生的全部。在她生病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只要看到子女守在跟前,她就督促他们赶紧下地。

岳母的生日在农历七月,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会带着岳母回老家小住。有一次,我带母亲去看望岳母,她非要张罗着让保姆冲鸡蛋招待我母亲。保姆(其实是她的外孙女)端了一盆水让我母亲洗手,岳母在一边督看,但我的母亲已行动迟缓,在她还没有洗手时,她的外孙女却已将毛巾递了过来。岳母见外孙女有些敷衍,便用手打了一下外孙女递着毛巾的手。她这个细心的发现和举动,让旁边的我由衷地感动。日常生活中,老人常常被我们的粗心大意伤害,但他们似乎从无怨言。

岳母这次的生病,有许多细节都让人充满着不解与神奇。三年前,她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但是只要稍微能进食,哪怕是吃过之后因药物反应多半吐出来,她也要吃。但是这次却不同,在生病的两个半月除成功鼻饲的五次外,她几乎天天滴水不沾,粒米不进。你无论放什么食物到她嘴边,她都将嘴闭得紧紧的,或将食物用手抹去。刚决定让她住院的时候,她虽然一句话不说,但在半昏迷状态下,竟然将她九十大寿时我为她买的金戒指摘了下来放到她的一个藏宝盒里。她是不是内心已预感到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她是那么的热爱生活。无论是她慈祥的面庞还是她吃饭的样子,仿佛都在从容而安详地等待归去,而后来的治疗结果,反而让我们觉得破坏了她一生修来的尊严与安详。

与岳母相比,我母亲是体弱多病的一个。她被动进城,一方面是我的孝心,另一方面是家中有个酗酒的哥哥,无法照顾母亲。母亲从七十多岁离开农村,在城里生活了二十年了,突然有一天,她指着卧室里的家具告诉我,这些家具是逃荒的年月他们逃到这家人家,人家帮她保存着的,因此要求我带她回家。又有一次,妻子回山东老家,母亲看着二姐她们从冰柜里往外拿东西做吃的,她用拐杖敲着地板责怪:你们把家底都吃光了,媳妇回来咋交代?我知道母亲这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但,没有真正给跟在身边的母亲一个当家做主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做儿女的最欠缺老人的呢?还有一个母亲讲了无数次的故事,让我至今不能释怀。1960年大饥荒,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一天,她在坡里发现了一棵斜歪着的桑树,树梢上还有几串叶子,本想上树采摘,但实在无力。邻居家的李奶奶脚大,上去将桑叶撸下,母亲在下面看得心惊胆战,于是,情不自禁将所有桑叶装进李奶奶的篮子。下树后的李奶奶见此,只好自己动手将桑叶分开,并考虑到我们家人多,多给了一些。母亲说,如果没有那些树叶,一家十口人那晚可能要暗宿了(不生火不吃饭为暗宿)。饥饿到如此地步的一个关于礼让的细节,就是那一代人在“财宝”与他人面前的选择。他们的人格与坚守,如果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身上体现,我们的亏欠就更多了。我们没有走进他们的内心,我们更多的是关心孩子或单单注意了老年人的物质层面的需求,我们是多么的无知。

所幸,今年夏天儿子回国度假期间,我让他拍了一个关于老人无法找到自己失去的家园的纪录片来关注我们与老人之间的这段看似不远的距离,取名叫做《奶奶要回家》,总算弥补了我心里的一点缺憾。

沉思默想

安立志

## “马上湖”与“仕高山”

地理易名,表面上是文化,其实是良莠难分的风水文化或八卦文化。

经过几轮GDP主义的喧嚣,许多官员开始“文化”起来。一些地方争古人、塑古像、修古庙、建古城,良莠不分,真假不辨,甚至连孙悟空、西门庆这类或虚幻或丑恶的神话或文学人物,也成了竞相争夺的文化标。这些年,仅因地名包含着文化元素,就闹出不少新闻。

先不说我国市行政的混乱(有直辖市、单列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为旅游的,如南坪改为九寨沟、大庸改为张家界、灌县改为都江堰、中甸改为香格里拉……为“平衡”的,荆州改为“荆沙”,襄阳改为“襄樊”,只是反对声浪甚大,才会回归与复辟。下面两例,大约属于求“吉利”、为“升迁”的。

骆马湖位于宿迁市区西北部,地跨徐州、宿迁两市,水域总面积375平方公里。骆马湖因龙马救子的美丽传说而得名。《宋史·高宗本纪》载:“绍兴五年(1131)四月金将渡淮,屯宿迁县骆马湖。”可见,骆马湖这个名称已有上千年。然而,21世纪第一个10年未尽,没有文化的当地“父母官”因忌惮任职“骆马湖”而“落马”,在策划大师的忽悠下,竟将骆马湖改为“马上湖”。是升迁的急不可耐,还是“落马”的风声鹤唳,抑

或信仰的迷信乖张?局外人不得而知。不要以为这是记者或网民的“仇官”心理,这有该市曾经矗立的巨型广告牌为证:“游马上湖,马上有福,全力争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山西的石膏山,位于灵石县城东南约35公里。这里,奇峰耸翠,高人云表,风景奇特。不要以为石膏山盛产常见的医用石膏。《春秋左传》曰:“膏者,神之液也。”这里的石膏,是指山中流出的乳白色汁水,遇空气凝结而成的钟乳石。自然遗产且又历史悠久,自然会引起官员垂注。灵石县委书记杨洪有文化,他竟然伪造《仕高山宋太祖赐名》之典故,假托赵匡胤的口吻,将石膏山改名“仕高山”,并且假传“圣旨”:“凡到仕高山者,无官者可以入仕,居位者可以升迁!”然而,“仕高山”并没有保佑杨洪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相反,刚刚改名一个来月,杨洪的仕途却戛然而止,他因腐败被检察机关查办了。

承平时期,频改地名,此种现象正常吗?时评作者众说纷纭,看法不一。我以为,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处理权力与文化之关系。在中国古代,如非改朝换代、皇权

避讳或政区调整,对于承载着历史、文化、民俗的地理元素,官员们通常保持着足够的尊重与敬畏,决不会肆意动手中权力,随便改变山川名称与人文布局。这似乎并非仅因官员的科举出身而学养深厚,而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厚重传统所致。与此同时,古代一些官员在重视传承的同时,往往利用自身的文化影响与文学造诣,成就新的文化事业。

苏轼知徐州,职务不在宿迁官员之下,但他从来不曾改变九里山、云龙湖之称谓,倒是因其政绩与文章,在徐州留下了苏公堤、快哉亭与放鹤亭,成就了新的文化胜迹。滕子京虽遭弹劾而就职巴陵,但地位也并不在灵石书记之下。巴陵任上,他从未利用手中权力,把“洞庭湖”改为“提拔湖”,把“岳阳楼”改名“升迁楼”,以改变自己的窘境。他的岳阳楼项目,只是重建而已。经费的筹集、诗文的邀约,不仅优化了建筑结构,而且注入了文化内涵,由其约稿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楼名文,名扬天下,有谁知道重建组织者滕子京?即使在宿迁,清帝乾隆六下江南,五次驻蹕该地,乾隆皇帝从来不曾担

心“落马”而远避他处或改变称谓,反而在此特设“乾隆行宫”,御笔题字的“敕建安澜龙王庙”,成为今人大加渲染、深度开发的旅游资源。

权力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正确运用,无疑是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基本保证。然而,权力的不当运用,必然贻害无穷。鬼哭狼嚎的整人,是用政治包装的权力;粗放浮夸的发展,是用经济包装的权力;毁真造假的复古,是用文化包装的权力。研究骆马湖的文化内涵,因害怕“落马”而改名“马上湖”;研究石膏山的文化渊源,为追求升迁而改名“仕高山”。地理易名,表面上是文化,其实是良莠难分的风水文化或八卦文化。然而,“马上”与“仕高”,却暴露出赤裸裸的“向上爬”。

权力有权力运行的法则,文化有文化发展的逻辑。动用权力促进文化发展,应当以尊重文化的逻辑为前提。如同前些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的发展一旦成为GDP,文化往往会沦为权力的奴仆。不仅文化本身会发生质的变异,附丽于文化的权力,也会暴露出粗鄙、低俗、暴虐、野蛮的本质。而这才是文化发展应当警惕的。